

#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 动态变迁分析<sup>\*</sup>

秦广强

**摘要:** 结合市场状况与制度分割两大维度,利用相隔十年的两个时点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中国中间阶层在性格特征和功能取向上的异质性及变异性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两类新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代际延续性有增强趋势;高阶层地位认同由之前的体制内中间阶层“一枝独秀”转变为由体制外中间阶层领衔;体制内中间阶层的政治取向保守,而体制外中间阶层则由相对“激进”转向平缓持中;生活方式上分化明显,两类新中间阶层高档消费特征突出,体制内新中间阶层生活相对安逸,而体制外和边缘型中间阶层的紧张焦虑感较强。

**关键词:** 中间阶层 异质性 变异性 性格特征 社会功能

##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尤其是社会结构变革中,中间阶层的发育和快速成长已成为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学界研究围绕中间阶层的性质与界定、规模与比例、类型与构成、功能与后果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一般公众和市场分析人士往往将中间阶层与收入、住房、教育、消费等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随着近一段时期“中产阶级焦虑”“中产阶级的不安与不甘”等话题的热议,中间阶层问题俨然上升为一个备受各界关注的公共论题。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中间阶层是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复杂化中出现的新事物,它是相对于社会关系而言的特定群体。确切地说,中间阶层是从两分的阶级关系结构(资本家—工人)之中衍生出来、处于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拥有相对独立阶层位置和资源的特定群体。因此,中间阶层的定位更多是一个关系和结构取向的问题而非资源多寡上的等级问题,他们并非是在财富、收入、教育和消费等方面处于中等位置的群体。一些学者所谓“收入中产”“消费中产”“认同的中产”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中间阶层应有的关系性、结构性定位,政策性术语“中等收入群体”概念也不能抓住中间阶层群体的实质特征。

中间阶层整体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成员共享很多一致性和相似之处,而另一方面,中间阶层生成路径的复杂性和内部构成的多元性又使得该群体具有诸多内在和外显的异质性。当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并非一个整齐划一、性格特征鲜明的阶层实体,而是一个包括多层次的群体集合,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存在。其中既有“新一老”之别,也有“主体”和“边缘”之分。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其构成更具复杂性:由于再分配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社会结构中催生出新的中间群体,其中既有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间阶层群体,也有市场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间阶层群体,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成熟起来的中间阶层在衍生路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在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上也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

---

<sup>\*</sup>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及社会整合研究”(17CSH031)、中央民族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聚焦中国中间阶层的异质性及其历时性变迁问题。一方面是内在生成路径的异质性问题,从基本的群体分类着手,对这些总体上处于相同阶层位置的群体进行集体“识别”,划分出四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类型;另一方面延伸到外显的异质性特征“确认”上,延循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性格—功能后果)的逻辑框架,将结构位置与阶层意识和功能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从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代际继承性、阶层认同、社会功能彰显(政治功能、生活与消费趋向)等维度对其异质性表征加以把握和呈现。另外,本文将结合相隔10年的两个时点的综合性调查数据,将相关讨论放置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对中间阶层的整体一致性画面和内部异质性边界进行勾勒的同时,重点揭示中间阶层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会呈现出哪些变与不变的态势。

## 二、中间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生成路径

对中间阶层的结构、意识和功能问题进行分析,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关于中间阶层的界定和分类框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需要在一个历时性的视野中进行梳理和辨析。

### (一) 中间阶层的四种基本类型

#### 1. “老中间阶层”

有关中间阶层的发展(演化)问题,需要追溯到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研究上。他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和食利者、手工业者、农民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或者跌落到无产阶级队伍,或者少量上升为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97)。这些论断构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基本共识。这一套阶级关系论述中,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二元阶级结构的附属产物,游离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的基本阶级关系之外。

对于这部分成员,马克思用的较多的概念是“中等阶级”或“中等阶层”,这就是学界常说的“老中间阶层”(old middle class)的理论源头。需要说明的是,“老中间阶层”的“中间”位置主要体现在其所处的雇佣地位上,他们自身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拥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从人群构成上看,小雇主、小业主和自雇佣者是老中间阶层的主体部分,在中国社会,它主要是指伴随着市场化转型而出现的小业主和个体工商户。

#### 2. “新中间阶层”及其二分类型

现代意义上的新中间阶层成长于“二战”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达伦多夫所说的“资本分解”和“劳动分解”过程(Dahrendorf, 1959: 41 - 57),一个在传统的阶级关系结构之外,与资产阶级和体力工人明显不同的、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迅速崛起。他们靠知识和技术为生,从事着非直接生产性的、非体力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李友梅, 2005)。那些被形象地称之为“白领”“穿黑外套的工人”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构成了中间阶层的核心成员。

这些人群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老中间阶层相比,均表现出一定的不同:与资产阶级相比,他们处于被雇佣地位,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工人阶级不同,他们不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但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管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老中间阶层阶级也不相同,他们是传统的被雇佣阶级内部分化的结果。另外,他们的雇主也不再限于传统的资本家,而是越来越多包括了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的雇佣(李路路、孔国书, 2017)。

与西方社会的情形不同,当代中国新中间阶层的缘起和构成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再分配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构成了其产生的制度环境基础,在中国中间阶层的生成路径和群体来源与西方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张宛丽等人提出中国中间阶层来源于三个渠道: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张宛丽、李炜、高鸽, 2004);李路路等人则更直接地将当代中国城镇中间阶层划分成“内源型”(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中间阶层)和“外生型”(市场体制中产生发展的中间阶层)两种

类型(李路路、李升,2007)。本文对新中间阶层的分类也在很大程度上延循了这种思路。

### 3. “边缘中间阶层”

以行政和商业中的办公室职员群体为代表的常规非体力雇员——办事员、秘书、业务员等,他们也从事着非直接生产性的工作,属于较低层次的白领人员。他们与管理 and 专业人员不同,同时也与体力工人相异。一方面,这些人群典型地是作为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辅助角色工作的,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仅仅是使用相当标准化的技术,日复一日地开展重复性工作。尽管表面上看他们与专业人员以及管理者有相似的待遇,如享有固定的薪水和具有相对宽松的或灵活的时间安排(time-keeping arrangement),但他们在整体报酬水平和市场状况上均有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这些职员与体力工人明显不同,按照洛克伍德在《黑套工人》(The Blackcoated Worker)中的论述,如果说办公室内部的横向部门分割与纵向权威等级分化并没有彻底切断职员与管理者、监督者之间的亲密和私人的联系,那么办公室职员与工厂工人之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隔阂则是明显的、日益扩大的,原因在于彼此处于截然不同的权威关系链条上,分享不同的工作状况和市场状况(Lockwood,1958:81)。

#### (二) 中国中间阶层异质性的生成路径: 市场状况与制度分割

通过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中间阶层总体处于基本社会阶级关系之外,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但内部构成上却复杂多元,基本生成路径大体延循两种逻辑展开:

一是市场状况逻辑,即市场获益性和经济地位状况造成的差异,典型地体现在“新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的区分上。前者拥有对工作组织而言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管理和知识技能),一旦这些资产转移到其他雇佣组织,那么该组织将蒙受很大的损失。由此,雇主将下放和让渡权力,赋予他们最大的能够做出决定的权限和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效用的高度工作自主性。这些实践着重要的权威和技能角色的雇员将获得远高于一般雇员的报酬,且雇佣关系包含了更多的信任与道德意涵,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是对他们所提供工作的回报,更是对承担某种(管理)责任的‘补偿’和‘考虑’”(Goldthorpe,1982)。与之相比,那些在人力资本含量和资产专属性程度上都逊色不少的“边缘中间阶层”在市场获益性和经济状况上均明显存在差距。二者在劳动报酬上的差异既显著地体现在经济收入这一基本的形式上(如工资与薪金的差异),也体现在晋升机会、权力权限、工作稳定性和工作保障性等方面。

另外,老中间阶层虽然在雇佣关系和雇佣地位上具有特殊性,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较程度的工作自主性,但仍可以延循市场状况对其经济地位加以确认。米尔斯曾指出,从老中间阶层到新中间阶层,是一种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Mills,1951:73),从职业的市场状况来看,老中间阶层的经济获益和经济地位远逊于新中间阶层,有些个体工商户和自雇佣者的市场状况甚至不如边缘中间阶层。

二是制度分割逻辑,中国的制度变迁对中间阶层的发育和成长具有特殊影响,主要体现在新中间阶层内部两类群体的差异上。在“再分配—市场”二元机制作用下,形成了两类具有明显不同制度属性和阶级经历的中间群体:一类延循着诸多再分配体制特性,另一类则外生于市场之中,是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中国两类“新中间阶层”群体的生成分别延循两种路径展开,这就决定了其性格特征和功能取向既与西方社会不同,也在两类群体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 三、中间阶层异质性与变异性的表征: 阶级形成的逻辑

在“识别”并“确认”出四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类型之后,需要对其异质性的外在表征加以把握,我们延循阶级形成(阶级结构—阶级性格—功能后果)的逻辑分析框架,将结构位置与阶级意识和功能问题联系起来,从阶层地位获得、阶层认同、政治态度和生活消费四个方面讨论中间阶层各群

体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四个维度在客观阶层结构与阶层行动之间呈现出某种递进关系,构成了衡量阶级形成和阶层分化过程的层次结构。

### (一) 地位获得与阶层流动

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是遵循更替和重组的“循环”逻辑,还是代际延续与继承的“再生产”逻辑,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边燕杰,2002)。更多的经验研究支持再生产逻辑的论断,即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中被再生产出来(李路路,2002)。也有学者指出,两种逻辑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只是对社会不同群体的作用效能存在差异:中上层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更多表现为地位继承模式,向下或向上的流动机会都不多,而中间层受益于市场化进程带来的开放性,阶层流动趋向于自由竞争模式,流动机会较多(李煜,2009)。据此我们认为,相比于边缘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处于更高阶层位置的两类新中间阶层群体在地位获得和阶层流动上的“再生产”特性会更加明显。

另外对于两类新中间阶层之间的差异,有研究指出,内生型新中间阶层更多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特征,其职业经历、社会关系更多从父辈继承而来,因而其地位获得的继承性特征更为明显(李路路、李升,2007);与作为“存量”的内生型中间阶层位置相比,市场环境下的新中间阶层位置则是一种新的“增量”,为民众提供了更多新的流动机会和渠道。因此,我们认为,与体制内群体相比,体制外新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继承性相对较弱,而自由竞争的“循环”逻辑更为适用。

### (二) 阶层地位认同

阶层认同是处于一定客观阶层位置的成员对其地位所形成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早期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有阶层分化而无阶层化意识”(卢汉龙,1996:119-127)。近期的研究指出,阶层认同呈现出一定的分化,但地位认同明显下偏且中层认同比例偏低,出现了“地位认同向下偏移”(刘欣,2001;高勇,2013)“中间阶层认同急剧流失且向中下层偏移”(冯仕政,2011)等论断。

就中间阶层而言,我们认为不同群体的阶层地位认同存在差异,一方面这取决于各群体客观位置和经济状况的分化,如新中间阶层与边缘中间阶层、老中间阶层之间会因市场状况的分化而在地位认同上出现等级差异性;另一方面,近年来成员评判社会地位的参照标准发生了变化,参照基础从之前的单位类型和社会归属转换为市场机遇(收入等)(高勇,2013)。这一转变对于两类“新中间阶层”的地位认同具有特殊意义:体制内中间阶层的地位优越性会有一定程度减损,其地位认同会有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而体制外新中间阶层的地位认同则会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 (三) 社会政治态度

关于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问题,研究者大多是从整体层面加以判定,形成了三种典型论断:积极寻求变革的激进型力量,安于现状的保守性势力和无独立作为的依附型角色(李路路,2008)。李春玲对不同中间阶层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区分,指出新中间阶层持有矛盾的社会政治态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意识,另一方面作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社会生活满意度高,政治保守态度明显;老中间阶层总体展现出保守主义政治倾向,而边缘中间阶层民主意识和社会公正理念强烈,可能是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群体(李春玲,2011)。李路路等人(2007)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再分配体制环境中的中间阶层政治态度相对保守,而市场条件下的中间阶层政治意识较为激进。另外,中间阶层的政治功能取向也并非一成不变,亨廷顿曾指出,中间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可能会经历几个阶段,最初登上舞台的中间阶层和后期的成员明显不同,随着队伍的壮大,其行为态度也会由革命性逐渐趋于保守性(亨廷顿,1988)。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我们从更为直接的政治态度测量着手,考察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尤其是民主政治意识和非制度性行动参与问题,以及其内部异质性和历时性演变。

#### (四) 生活方式与消费实践

有关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论调(Chan & Goldthorpe 2007):一种可以称之为“个体化论”(individualization),即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不再与社会阶层甚至是更大范畴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系统性关联,而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个体化”的色彩,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第二种可称之为“同源论”(homology),主张结构决定,认为群体消费和生活的形式就是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外在表现;第三种与第二种相对,可称之为“建构论”(constructivism),强调生活方式、消费实践等生活经历建构着人们对某一阶层的认同与归属。以此论之,中间阶层各群体在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上的特性可能表征为截然不同的几个面向:碎片化的“中间层”、结构化的“中间层”和认同的“中间层”。

三种论点虽然均不乏支持者,但更多的经验性证据支持“同源论”或者说“结构决定论”,如刘精明等人的分析发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高品位消费、高雅休闲和生活舒适等方面的倾向明显,而自雇佣者与体力劳动者相近,在通俗娱乐方面的倾向突出,普通办事人员的生活方式特征则介于上述两类群体之间(刘精明、李路路 2005)。我们将利用经验数据考察中间阶层的客观位置与生活消费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这种关联能否以清晰的边界和稳定的形式呈现出来。

### 四、中间阶层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经验分析

#### (一) 数据、样本与操作化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相隔十年的两个时点(2003年和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两个年份的调查均采用PPS与分层设计的抽样方法,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分别抽取了5894个和11438个样本,其中2003年调查只包括城市样本,2013年调查同时包含城市和农村样本。为便于参照比较,我们选取了两个年份中城镇地区22-66岁之间的社会经济活动人口作为分析样本。

经验操作层面,我们对中间阶层的界定不是基于收入、教育和声望的等级分类,而是由权力和自主性定义的职业阶层,它典型地体现着以资源占有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具体而言,首先结合两个年份数据中受访者的职业细类(ISCO88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区分出老中间阶层(自雇佣者和个体户)、新中间阶层(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和边缘中间阶层(一般办公室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辅助人员)三种类型,然后按照所有制形式(国有部分和非国有部门)对新中间阶层进行细分,区分出延续再分配体制特征的内源型新中间阶层和市场体制中产生发展的外生型新中间阶层两类,由此生成四种中间阶层基本类型。两个年份中四类群体的样本总量分别为1550个和2058个。表1展示了两个年份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的数量及比例分布。

数据显示,十年间一个特别显著的变化在于,处于再分配体制之外的新中间阶层规模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整个中间阶层的比例均增加了两倍多。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转型提供了更多的外源型新中间阶层的结构性位置,给各阶层成员提供了更多竞争性的流动机会。体制内中间阶层比例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另外,边缘中间阶层的比例明显下降,而由个体户和自雇佣者构成的老中间阶层的比例有一定幅度上升。

表1 中间阶层类型划分及规模变化

		2003		2013	
		N	%	N	%
内源型新中间阶层	管理人员	113	7.3	125	6.1
	专业技术人员	405	26.1	472	22.9

续表 1

		2003		2013	
		N	%	N	%
外生型新中间阶层	管理人员	35	2.3	151	7.3
	专业技术人员	64	4.1	285	13.8
边缘中间阶层		509	32.8	393	19.1
老中间阶层		424	27.4	632	30.7
总计		1550	100.0	2058	100.0

## (二) 地位继承性

在表 2 中,我们分别利用两个时点的数据建构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来考察不同中间阶层群体在地位获得上与其父代地位之间的关联性。两个年份模型计算结果均控制了子代的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代表其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状况的受教育水平变量和党员身份变量。

表 2 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

		子代地位(以工人/农民为参照类)							
		CGSS2003				CGSS2013			
		内源型新 中间阶层	外生型新 中间阶层	边缘中间 阶层	老中间 阶层	内源型新 中间阶层	外生型新 中间阶层	边缘中间 阶层	老中间 阶层
截距		-4.235***	-3.051***	-2.370***	-.215	-4.223***	-1.414***	-2.244***	-.341
父代职业 (以工人/ 农民为 参照)	管理人员	.423	.583	-.004	.126	1.146***	.873***	1.152***	.055
	专业技术人员	.421*	.649*	.312	.040	.741***	.480*	.415*	.133
	日常办事人员	.204	.333	.563***	-.352	.185	.321	.286	-.791*
	自雇佣者	-.297	.938	-.220	.980***	.402*	.335	.24	.419*
控制变量		已放入				已放入			
模型拟合		N = 2709; -2LL = 3927.44; Df = 36;				N = 3197; -2LL = 4607.37; Df = 36;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003 年数据结果显示,与父代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父代为“管理人员”的子代,在获得内源型中间阶层和外生型中间阶层位置上均没有显著优势(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不显著),父代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在获得新中间阶层位置上具有一定优势,而日常办事人员和自雇佣者,也只是分别在子代获得边缘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位置时具有一定优势。2013 年数据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结果,与父代为“工人/农民”的子代相比,父代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在获得新中间阶层位置时均有显著优势。以父代为“管理人员”为例,其子代获得内源型中间阶层、外生型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的可能性比获得“工人/农民”地位的可能性要分别高出 3.1 倍、2.9 倍和 3.2 倍。

综合来看,在 21 世纪初期,“新中间阶层”地位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阶层竞争性流动的结果而非传统精英群体自身的延续和再生产,因为不同阶层出身的相对流动机会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性,尤其是管理人员的后代在获取更好位置上没有明显优势;而 10 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阶层固化和再生产的特征凸显,阶层间相对流动机会差异性拉大,精英群体的后代无论在成为体制内精英还是体制外精英上均具有明显优势。

## (三) 阶层地位认同

CGSS2003 数据中对主观阶层地位的测量采用的是“五等级”(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形式,而 CGSS2013 数据则采用的是“10 分制”(最低 1 分,最高 10 分)。我们以阶层地位认同为因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比较几类中间阶层的主观地位状况。模型分析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受教育水平、收入、房产、党员身份等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表 3 经验结果显示,2003 年数据中体制内中间阶层的地位认同明显处于领先地位,这种优势我们甚至可以用“一枝独秀”来加以形容;而体制外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的地位认同大致相当,老中间阶层的地位认同在中间阶层各群体中处于最低位置,且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差距不大;到了 2013 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外生型中间阶层处于最靠前位置,从系数值比较来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体制内中间阶层排在第二位,而几类中间阶层明显拉开了与工人/农民的地位差距。

内源型与外生型中间阶层地位认同领先地位的互换可以由多方面来解释:一种可能是二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确实呈现出差异,地位认同上的排序互换是对客观资源和机会相对变化的反映;另一种可能是阶层地位认同参照系发生了变化,人们评价自身地位的参照标准从单位类型和社会归属演变为市场机遇,在此背景下,收入、财产、房产等经济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这方面体制外中间阶层明显具有优势。

表 3 以阶层地位认同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CGSS2003 五等级阶层地位认同 (Ordinal Probit 模型)	CGSS2013 1-10 分阶层地位认同 (线性回归模型)
	$\beta$	$\beta$
阶层地位(工人/农民为参照)		
内源型新中间阶层	.367***	.395***
外生型新中间阶层	.163	.516***
边缘中间阶层	.168*	.247*
老中间阶层	.049	.332***
控制变量	两个模型均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党员身份、上一年度总收入、是否拥有房屋产权、房屋建筑面积等变量	
(常量)	—	4.041***
Cut1	-.306*	—
Cut2	.758***	—
Cut3	2.419***	—
Cut4	3.696***	—
似然比卡方	464.3	—
调整的 R <sup>2</sup>	—	.086
F 统计量	—	25.2
N	2426	3087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 (四) 社会政治态度

我们可以通过对中间阶层社会政治态度的测量,来把握其社会政治价值取向,进而评估和推测他们可能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2003 年和 2013 年两个年份的 CGSS 数据均设置了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以测量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意识状况,表 4 数据展示的是两个调查时点不同阶层群体在一系列民主政治议题上表示“同意”的比例。

表4 中间阶层的民主政治态度(对相关议题表示同意的百分比)

	2003					2013				
	内源型	外生型	边缘中间阶层	老中间阶层	工人/农民	内源型	外生型	边缘中间阶层	老中间阶层	工人/农民
民主就是政府为民做主	56.2	47.5	60.7	69.9	70.5	68.5	65.1	66.3	78.4	77.7
直接民主	51.1	61.6	56.4	64.2	62.4	64.4	66.7	64.6	67.4	69.0
间接民主	81.3	79.8	81.7	75.1	76.5	81.9	75.5	81.3	74.9	79.0
大众民主	83.8	84.8	82.9	77.5	78.9	84.1	78.9	76.5	77.9	79.2
精英民主	24.7	25.3	26.5	35.8	33.9	21.8	23.4	24.6	28.7	26.5
结果合理	79.5	76.8	79.4	78.4	81.6	75.5	78.0	74.4	78.5	78.5
程序合理	65.3	79.8	69.8	67.0	69.7	75.5	75.2	72.4	70.2	73.1

首先是两个时点中反映出的一致信息。在“民主意味着什么”这一基本政治理念上,老中间阶层和工人/农民的态度较为接近,这些社会中下层群体展示了更为突出的“政府要为民做主”“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的朴素情怀;在直接和间接民主问题上,体制内新中间阶层、边缘中间阶层态度相对保守,他们对“直接民主”的认同度明显低于其他阶层,而对于“间接民主”的认同度则较高,这反应了体制分割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对他们政治意识的制约。相比而言,外生型中间阶层对直接民主的认同高于前两类群体,对间接民主的认同度则低于他们。内源型中间阶层更认可大众民主,更不赞成精英民主,这可能是他们囿于体制身份而作出的“政治正确”的判断,中下层群体可能受制于知识文化水平,或可能延循“威权主义政治意识”,在精英民主上持更开放的态度。

其次是两个时点的差异性。出现较大变化的是外生型新中间阶层,2003年这部分群体对“民主就是政府为民做主”的说法表示同意的比例低于半数,远低于其他群体,可见他们对这种民主实质表示深深的质疑或批判态度,而到了2013年,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明显缓和,与体制内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基本一致;另外,在2003年外生型中间阶层对“大众民主”和“程序合理性”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相关比例数字均处于最高位置,但十年之后,他们在这两方面的态度都变得平缓。

#### (五) 生活方式与消费实践

在两个年份的调查中,均设置了一组对受访者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进行测量的问题,每个问题的选项均有“很符合”“较符合”“不太符合”“很不符合”四个等级。我们采用主成分和最大方差法对2013年数据<sup>①</sup>中的这些变量展开因子分析,从中析出了5个因子,这5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7.2%。我们根据各变量在因子上的载荷对其进行命名(参见表5):因子1命名为“高档消费”,反映了人们在购物、家庭装饰、出行、健身方面的高等级消费倾向;因子2为“安逸优雅”,反映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感受和一定程度的艺术欣赏倾向;因子3为“生活节俭”,代表的是生活上较为节俭的倾向;因子4为“通俗娱乐”,休息时间收看电视节目反映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娱乐倾向;因子5为“工作紧张”,反映了一些人群工作紧张、焦虑的状态。

<sup>①</sup> 2003年数据也采用同样方法进行了分析,得到的因子数量、类型、方差贡献率均较为相似,后续的阶级差异性结果也较为相近,限于篇幅,在此未一一列出。



表 5 生活方式因子

	因子 1 高档消费	因子 2 安逸优雅	因子 3 生活节俭	因子 4 通俗娱乐	因子 5 工作紧张
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高档	.848	.062	-.098	-.055	.007
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	.783	.102	.010	-.065	-.028
我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	.693	.171	-.247	-.026	.132
我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小汽车	.628	.174	-.258	-.041	.166
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	.427	.319	.175	-.552	-.003
我觉得现在过得很舒适、安逸,生活上没有着急事	.054	.800	-.041	.225	-.136
在休息时间总是要听些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	.267	.657	-.053	-.224	.137
除非必要,从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之外的物品	-.189	-.013	.848	.121	.106
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总是到附近餐馆去聚餐	.338	.386	-.445	-.048	.275
我在家里的休息时间多数是看电视度过的	.033	.139	.223	.835	-.045
我从事的工作总是很紧张	.088	-.016	.048	-.037	.950

根据样本因子得分,我们可以比较各因子在中间阶层不同群体上的均值得分,以此衡量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上的分化程度。表 6 数据结果显示,两类新中间阶层在“高档消费”上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且在“生活节俭”“通俗娱乐”上的得分为负值,两方面相互印证,均有力支撑了米尔斯所谓的新中间阶层“消费前卫”的论断;在“安逸优雅”因子上,内源型新中间阶层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阶层,平时生活舒适安逸且伴随艺术欣赏的生活方式风格突出;工人/农民的生活节俭倾向明显,而其他几类中间阶层在这一因子得分上均为负值,这是中间阶层作为整体呈现出的一致性特征;老中间阶层和工人/农民群体在“通俗娱乐”上倾向明显;最后,外生和边缘中间阶层身上体现出更为明显的工作紧张、焦虑的倾向。

表 6 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因子得分均值比较

	因子 1 高档消费	因子 2 安逸优雅	因子 3 生活节俭	因子 4 通俗娱乐	因子 5 工作紧张
内源型新中间阶层	.245	.302	-.082	-.161	.095
外生型新中间阶层	.377	.089	-.150	-.325	.182
边缘中间阶层	.137	.123	-.185	-.156	.121
老中间阶层	-.060	-.084	-.044	.187	-.106
工人/农民	-.220	-.144	.145	.122	-.078
组建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F 值)	46.651***	25.167***	15.007***	29.480***	10.463***

总体来看,我们能够从不同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中辨识出一些相对清晰的维度,这表明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群体生活方式存在着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取向,并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典型维度有着明显的阶层分割。

## 五、结论与讨论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群体集合和多元化的社会存在。本文结合市场状况和制度分割两大维度,对总体上处于相同位置的中间阶层群体进行识别和确认,区分出四种基本类

型,进而延循阶级形成的逻辑,使用相隔10年的两个时点的综合性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当代中国城镇地区中间阶层的性格特征与社会功能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提供了一种分析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分化的类型学模型和历时演进的视角。

第一,中间阶层内部的群体异质性在四个递进性维度上均有明显体现。阶层地位获得上,2013年数据结果显示,相比于其他群体,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子代无论在成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新中间阶层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新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代际继承性即“再生产”特征突出;阶层地位认同上,两类新中间阶层的主观认同地位始终位居前列,而老中间阶层的地位认同甚至与工人等低层群体较为接近;民主政治态度上,体制内新中间阶层表现出了更为保守的政治意识,再分配体制的路径依赖印迹明显;生活方式及消费实践上,两类新中间阶层高档消费特征突出,体制内新中间阶层生活相对安逸,而体制外新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的工作紧张感、焦虑感较强,老中间阶层在“通俗娱乐”上倾向明显。

第二,中间阶层的性格特征与社会功能会发生动态性变迁,制度变革与市场化浪潮是重要推力。在内部构成上,近年来体制外新中间阶层的规模比例大幅度增加,这反映了我国市场化快速推进和产业结构调整对职业分布和阶层结构的影响;阶层地位获得上,21世纪初期不同阶层出身进入中间阶层尤其是进入两类新中间阶层的相对机会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近年来,新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这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全确立,优势阶层能更好地利用市场排斥机制实现阶层再生产,“体制排斥”和“市场排斥”的双轨并行或“市场排斥”机制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代际流动形态的变化,中国社会由此存在阶层固化的可能性;阶层认同上,高阶层地位认同由之前的内源型新中间阶层“一枝独秀”转变为由外生型新中间阶层领衔,这既反映了二者客观地位的相对变化,也反映出阶层地位认同参照系从传统的单位类型和社会归属到新的市场机遇的变化;民主政治态度与行动参与上,外生型新中间阶层由相对“激进”转向平缓和持中,这部分群体的发育成长都得益于政府主导的经济起飞和增长过程,因而其政治态度与功能取向转向保守。

第三,中间阶层内部的群际分化围绕市场状况和体制分割两条路径展开,也即现代化逻辑和制度逻辑共同作用于中间阶层的发育成长和功能彰显。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技术的发展,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与工业化功能需求相匹配的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分布,由此中间阶层队伍的规模和比例大幅度提升,并且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取决于其市场地位和市场获益性程度,即市场能力和市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群体的阶层地位和阶层状况。新中间阶层、边缘中间阶层和老中间阶层在地位获得、身份认同和生活消费上的分化均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就中国社会特性而言,体制分割(再分配与市场)仍然构成了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发育成长的重要制度基础,尽管当前社会群体都在向一般的社会分化——社会结构阶层化、利益关系市场化转变(李路路,2012),但在中间阶层特别是两类新中间阶层身上,体制分割的烙印依然清晰,这尤其体现在两类新中间阶层政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上。

第四,就未来趋势而言,中间阶层仍将作为一个包含多层次的群体集合而存在。从异质性角度来看,两类新中间阶层在权力、资源和机会的分配结构中仍将处于优势地位,尽管与以大财产所有者、政治权力拥有者为代表的社会上层相比具有差异性,但基于组织管理才能和专业知识和技能,其市场报酬、工作权威状况和社会声望等均强于其他中间群体和底层群体,因而其在政治地位、公共话语权、经济消费等方面将扮演更具主导型的角色。并且,新中间阶层地位获得的代际延续性会继续增强,中间阶层内部的群体边界将变得更为清晰。在这种情况下,边缘中间阶层作为低层次非体力阶层将扮演“缓冲带”角色(Parkin,1971),为下层群体提供可能的上升流动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社会上层与下层相分割的体系崩溃。另一方面,就同质性而言,中间阶层整体仍处于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这种结构性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仍将呈现出维护现有秩序和权力结构的倾向,在地位和身份认同上仍将是“社会中层”的主体力量,在经济消费领域继续扮演明显优于低层群体的“消费前卫”角色。

##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 冯仕政 2011,《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
- 高勇 2013,《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社会》第4期。
- 亨廷顿 塞缪尔,1988,《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李春玲 2011,《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第2期。
- 李路路 2002,《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2008,《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 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2012,《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路路、孔国书 2017,《中产阶级的“元问题”》,《开放时代》第3期。
- 李路路、李升 2007,《“殊途异类”: 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友梅 2005,《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煜 2009,《代际流动的模式: 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社会》第6期。
- 刘精明、李路路 2005,《阶层化: 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欣 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卢汉龙,1996,《城市居民社会地位认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 1992 - 1995》,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97,《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张宛丽、李炜、高鸽 2004,《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Chan, T. W. & J. H. Goldthorpe 2007,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ic in England.”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1).
-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 H. 1982, “On the Service Class, its Formation and Future.” In A. Giddens & G. Mac 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ckwood, D. 1958, *The Blackcoated Worke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Mills, C. Wright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in, F. 1969,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 (4).

作者单位: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石金群

**The Analysis on Heterogeneity and Dynamic Change of Middle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Qin Guangqiang*( 1)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market situation and system segmentation. Based on the data in two time points ( with the gap of ten years)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eter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in character and function among middle clas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or the two kinds of new middle clas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of status acquisition has the tendency of enhancement; regarding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high class status , it has transformed from former identification with middle class within the system exclusively to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iddle class outside the system mainly; for the middle class within the system , their political orientation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 while for the middle class outside the system , their political orientation has transformed from relatively “radical” to smooth and mild; the differentiation in lifestyle is obvious ,the characteristic of high consumption is obvious for the two kinds of new middle class ,while the new middle class within the system is relatively comfortable in life ,but the new middle class outside the system and marginal middle class have stronger sense of tension and anxiety.

**Keywords:** Middle Class Heterogeneity Variability Character Social Functi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Generations** ..... *Zheng Dandan*( 12)

**Abstract:** Regarding several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s time node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three gener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style individualization is “disembedding from the past and integrating with the future. ” For the individuals who have begun to disembed from tradition ,the future dimension embodied in the continuity of clan has the implication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powerful embedded function. Regard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 their superposition effect has shaped the imbalance statu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ies and the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one-child families would invest in children unlimitedly ,it’s undoubtedly logic while they have no other altern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economic normal ,especially in the condition of new change in population policy ,the new pattern may appear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families.

**Keywords:** Individualization Integ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System Superposition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Youth’s Housing Dream** ..... *Huang Jianhong*( 23)

**Abstract:** Regarding the effect of “dual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n the rule of urban resource allocation ,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a classical proposition. Namely ,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is a process of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self-achieved competence on the individuals’ resource acquisition ,meanwhile it’s also a process of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ascribed factors on the individuals’ resource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quisition of urban youth’s house property right ,this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ual transition” has certainly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uth’s self-achieved competenc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house property right , the youth who have diploma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ouse property right; the “dual transition” has weakened the influence of ascribed factors in institutional level on the acquisition of youth’s house property right ,but it has also strengthened the influence of ascribed factors in family level on the acquisition of youth’s house property right; due to the family ascribed factor of one-child family structure ,the “post-80s” youth have more advantage to acquire house than “before-80s” youth ,but they couldn’t have the advantage to acquire house by the institutional ascribed factors of working unit. In the context of “dual transition” ,the influences of self-achieved competence and ascribed